

[日]釜屋修 著
梅娘 译



玉米地里的作家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玉米地里的作家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06.7/397

玉米地里的作家

——赵树理评传

11.50.1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日)釜屋修著;梅娘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9

ISBN 7-5378-2120-8

I. 玉... I. ①釜... ②梅... II. 赵树理—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691 号

玉米地里的作家

〔日〕釜屋修 著

梅 娘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82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 7-5378-2120-8

I·2041 定价:6.80元

序

董大中

我跟釜屋修先生相识，是因为这本书；我跟梅娘相识，还是因为这本书。现在，面对着他们一位译者，一位著者，我不能不说几句。

1979年初我调到《山西文学》(当时叫《汾水》)编辑部，编理论批评稿件。一天，编辑部收到一包国外赠书，打开一看，是《中国的光荣和悲惨——赵树理评传》，有著者釜屋修先生的题字。当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李国涛，把书交给我，让写一封回信，表示感谢。我用了编辑部的名义，将信寄走。那是刚送走了让人一举一动都胆战心惊的十年以后不久，“改革开放”还只是仅闻其声，未见行动，我只能“姑隐其名”。通过几次信以后，我大着胆子“亮”了“相”，这结果便是得到了釜屋修先生给我个人的赠书，而时间已是1980年的11月。在这前后，素不相识的上海社科院陈嘉冠先生，也寄给编辑部一本，为我所得。因此，把这本书说成我跟釜屋修先生相识的媒介，是很恰当的。

我没有学过外文，拿起书，有点茫然。亏了中日“同文同

种”，从夹杂在其中的一些汉字上，多少可以揣摸到一点意思。我最感兴趣的是谈《福贵》的一章，因为题目上有“返回”“人间”等字眼，向一位粗通日文的同事请教，他说可以翻译成“还我做人的权利”，而这正是我对这篇小说的理解。究竟釜屋修先生是如何论述的，我很想找人翻译出来。于是把陈嘉冠先生赠我的一本送给那位略通日文的朋友。也许由于事忙，也许由于日语水平不够，那位朋友好久没有译出来，我也就把这事忘了。

我已想不起来是怎样跟梅娘相识的。只记得，在《批评家》于1985年初创刊之前，我从中国文联出版的《文艺界通讯》上读到釜屋修此书第五章的译文，译者即是梅娘（署名孙嘉瑞）。1988年，我在《批评家》上刊发了梅娘译的第十章，而谈《福贵》的一章是由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赵树理研究》发表的。在那篇译文之前，梅娘有一封给编者的信：“1988年有一次与康濯同志相见时，谈及老赵。他问‘釜屋有一篇评论《福贵》的文章，你见过没有？’我说，我有一本釜屋专论老赵的单行本《光荣的生与悲惨的死》，其中，《还我做人的权利》是评论《福贵》的。康濯同志很欣赏这篇论文，特意嘱我译出交他推荐发表。我将此文译出后，康濯同志已住入医院，我曾到医院去看过他几次，但已无法再提此事。现在，康濯同志已去，但是他的殷切之情和我对老赵的思念，久久无法拂去。因此，将此文寄给贵刊。”

我跟釜屋修先生见面，是在1986年9月。那时，为纪念赵树理诞生80周年和举行第二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山西省作家协会邀请了日本、美国的七八位学者来太原，其中就有釜屋修先生。我向釜屋修先生提到梅娘，已是1994年8月先生第

二次来太原的时候。那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工作，为期半年。说到梅娘 15 岁即到日本，在大阪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許多小说，说到梅娘这几十年生活的艰辛，釜屋修先生又惊又喜。回到北京，他立即前往拜访。从此，他们也建立了通信关系。

请人翻译这本书，是我早有的想法。诚然，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显示出一位外国学者的眼力和学力。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学术界翻译了许多外国理论著作，引进许多思潮和方法，1985 年还被称为我国批评界的方法年。这对活跃我国学术界、批评界，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过去译介进来的批评著作，都只是批评外国作品，跟我们终隔一层。我想，如能有外国学者，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出发，站在一个遥远的也更为客观的立场上来看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当代大众化的文学作品，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实际、有益的启发。由此自然想到了釜屋修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让人们领略一下外国学者是怎样全面地看待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是请人翻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之所以请梅娘翻译，不仅因为她已经译过三章，还因为她对这本书有比较深刻的把握。从 80 年代末起，我和梅娘几次见面，每谈到这本书，她都掩不住一股喜爱之情。她特别赞赏书中的评论部分。梅娘最近给我的信中，又一次称赞了釜屋修先生的严谨的治学作风。即使那有关生平事迹的三章，梅娘在给定的信中说，“这三章中的情节，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也不过的了。但是，作为日本的汉学者，釜屋不知涉猎了多少典籍，才深入浅出地描绘了一个中国作家的生活历程。”她说：“把釜屋的书完整地介绍给赵树理的爱读者，是釜屋的

喜悦,更是我的安慰。能为长者赵树理作点什么,这是我的幸福。”

梅娘跟赵树理,则不仅是文学上的契友,更是工作中的同事。梅娘是在沦陷区极受欢迎的一位女作家。她于1920年冬生在长春的一个富有者的家庭,父亲孙志远是一个实业家,经营粮食、建筑、铁路等行业。她名叫孙嘉瑞,也叫梅娘,以梅娘驰名文坛。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叫《小姐集》。到日本留学,她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第二代》。以后佳作迭出,4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有“南玲北梅”之称。从抗战后期起,她为寻找一条为祖国、为人民做好事的道路,到处奔波。全国解放前夕,她随丈夫柳龙光赴台湾后,丈夫不幸遇难,她毅然返回大陆,在刘仁同志的关怀下,到新成立的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工作,编《说说唱唱》。这个大众创作研究会是赵树理和王亚平、苗培时等人发起成立的。从此,梅娘和赵树理成了同事。以后,他们还一起在晋东南的平顺县下过乡,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梅娘对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创作和为人都很崇敬。她说能为赵树理做点事是她的幸福,乃由衷之言。这本书也是她跟赵树理友谊的一个纪念。

本书著者釜屋修,他在《后记》中已经写到了自己,我这里补充几句。第一,他生于1936年,今年是他的60岁寿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他也是个纪念。第二,写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在玉川大学教书。不久,他到东京私立和光大学任教授,1988年又到了驹泽大学。第三,釜屋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有研究,曾参加新版日译本《鲁迅全集》的译注。到和光大学以后,他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十几年来一直坚持活动,每年都出版研究会报。第四,赵树理是他的一个研究

重点,除这本书外,他还写过多篇论文,培养了好多年轻的研究者,他对赵树理的感情,读者在本书中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据著者说,本书原名《玉米地里的作家》发表时改成了《中国的光荣和悲惨》。我以为,前一个名字更为确切,就径自改回原名了。

1996年10月7日

谨致中国读者

我的一些文章翻成汉语，能见到中国读者，能见到中国赵树理文学爱好者，能见到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热爱赵树理人品的朋友们，感到非常高兴！

农村与农民，这个复杂的存在，又有旺盛的生命力、顽强的斗争力量，又有难改的封建性、政治上的保守性，但是它很有魅力！在这个先进和落后混合在一起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很可爱。我们的“老赵”，经过长期的、独特的生活经验，以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的眼光与愿望和改革农村的知识分子的视线，来栩栩如生地写这个复杂的农村。看他的作品，有时我感觉到，我隔壁坐着日本的潘永福、三仙姑。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农村濒临危机，日本的谷物自给率（1998）已下降到 37—38%。我非常怕日本农村被消灭；也非常担心人们丧失对农村文化前途的关心。

有时候，走在郊外，能看到田地，能闻到小时候在农村闻过的一股农村气味，我就赶快回家，从书架上取出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赵树理全集》，看一些作品。闭着眼睛回想山西，回

想尉迟村。

衷心感谢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北岳文艺出版社各位先生、女士对我的照顾。衷心感谢董大中先生、梅娘女士对我的鼓励！

2000年8月于日本

釜屋 修

目 录

序	董大中(1)
谨致中国读者	釜屋 修(6)
第一章 光荣的崛起与悲惨的辞世	(1)
第二章 山西省沁水县 ——上党柳子的故乡	(10)
第三章 流浪中的向往	(21)
第四章 进入斗争的漩涡 ——与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相遇	(27)
第五章 哄笑声声 ——作家赵树理的诞生	(35)
第六章 还我做人的权利 ——福贵的控诉	(46)
第七章 在苦恼的低谷中 ——失去了运笔的权利	(54)
第八章 再次投身农民 ——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村	(65)
第九章 变革中的农民 ——落后人物、青年问题	(79)
第十章 为农民读者	(92)
第十一章 赵树理文学的位置	(102)
后 记	(110)
附 录 伊藤永之介与赵树理 ——两个农民作家	(112)

第一章 光荣的崛起与悲惨的辞世

1970年9月23日,在中国山西省的太原市,一位作家——作家赵树理死了。这死……这死讯直到8年之后才加以公布。这个不同一般的公布说明死得悲惨。有着人民作家光荣称号的作家,竟这样死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前,赵树理举家从北京迁回了故乡山西,“四人帮”揪出赵树理的时候,赵正在山西省晋城县任县委副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作家陈登科在怀念赵树理一文中,这样写道:“从太原斗到晋城,从城里斗到乡下,他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几十斤重的铁牌

子，站在三张桌子垒起来的高台上，一时要他跪在桌子上，一时又逼他站起。就在他站起来的当儿，凶恶的打手，从他背后，猛力往下一推。这一推……赵树理同志从三张桌子上被推下，什么也就不知道了。当从死亡的道路又返过魂儿来，才知道他的髌骨被摔断了，肋骨也被打折，肺叶被肋骨戳通。那些打手们，又把奄奄一息的人，拖到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不到四天，赵树理同志便含冤离开了人间。”

这是同样蒙受迫害的前辈陈登科的回忆。

赵树理之死并非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个别事件。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文学家、演员、电影人、音乐家很多人都蒙受迫害。从被红卫兵殴打因而气愤投入太平湖自杀浮尸的老舍开始，杨朔、罗广斌、郭小川、冯雪峰、田汉、黄谷柳、何其芳、钱杏邨（阿英）、徐懋庸、柳青、邵荃麟，加上我们的老赵，统统死于非命。这些人就那样死去了，没有一则报道，报道他们是如何死去的。那种迫害的质与量，都超乎常情，现在，一些幸存的人才一点一滴地透露了实情。

诗人峻青说：能眼见屠夫操刀血流的景象，而心灵不受到残害的事吗？我们过早地披上白发，身上到处是病，宝贵的时光空空流去，这是生命的最大浪费。一位老朋友悲愤地吼道：“把笔还给我！”

诗人艾青说：“约计十年，我一本书也没有出，而且各地的图书馆把我的书都封存，不准读者借阅。我有4年，失去了人身自由。”

不准借阅，赵树理的书也同样遭禁。“四人帮”扬言：“解放17年来，文艺界是全无成果的空白期，因为是周扬的文艺黑线统治了文艺界。”

作家韦君宜说：文艺黑线统治了文艺界的这一论断，切断了老作家和出版社的联系，编辑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偶然相遇时，连互相致意也禁口，那些从未读过作家作品的红卫兵们，那些“革命群众”，向知识界投掷了仇恨。

作家李准说：那拍着桌子怒骂的声音迄今仍在耳边回响：喜旺是中间人物，李双双也是中间人物。《龙马精神》中一心扑在种地上的韩芒种是中间人物，《老兵新传》中的那个憨直的老战士也被划为中间人物。把这些一总括，我就是塑造中间人物的黑尖兵，丑化劳动人民，是人民的敌人。说我丑化劳动人民，绝对不能接受，他们那一系列的丑化，我只能嗤之以鼻。

赵树理被打成了中间人物的鼻祖。于伶、马可遭监禁达9年之久。一位墙报的作者愤怒地吼道：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9年！被监禁在自家书房里的巴金，被江青残酷迫害失去了语言能力的方纪，受迫害的还不仅仅是他们本人……。

刘白羽在谈到作家柳青受到迫害时说：林彪和“四人帮”残酷迫害柳青，迫使夫人致死。摧毁了他在长安县皇甫村的生活基地，剥夺了他10年之久的宝贵的创作时间，迫使他远离我们，使他无从完成《创业史》的写作计划。柳青62岁辞世，因迫害时遗留的病症而病逝。

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内，我们的老赵是怎么样了呢？从友人片断的追忆中，从片断的悼念中，赵树理的身姿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来了，与文艺界的诸多恶事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赵树理已经回了农村。

1953年赵树理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我之所以没有作品问世，可以举出上百条的客观理由。其实，真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远离了生活。”因此，赵在 1963 年回归农村，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夙愿。他拿起了久违的笔，开始了创作活动。依据体验，写就了长篇《三里湾》，又写了一些短篇。

1964 年夏，赵树理根据上党地区上党梆子的传统戏目，写了剧本《十里店》，按照“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时序，1965 或比 1966 年也可能还早，构想了长篇小说《农家》，也曾命名为《户》。预想通过三户农家的家庭变革，写出《三里湾》之后，由人民公社带来的社会主义农村的变革，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群像。根据新华社记者赵去世后所进行的采访，这个长篇未能完成。

赵树理 1964 年回乡，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席卷，迎来了不该有的悲惨时日，即使在“文革”的漩涡中，赵树理对农民的深情厚爱，对创作的独特热情，也完全没有消减。

1979 年 1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样一个特写：《老赵是咱社里人》。

……1963 年秋天，当“四清”运动刚刚开始试点的时候，赵树理再次返回太行山区，来到长治市黄碾公社，仍然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

……老社员还清楚记得赵树理朴实的形象：高个子、黑瘦脸，穿一件旧袍子、戴一顶黑毡帽、挟着一个抗日时期使用过的黄布包包、口袋里插着一根旱烟袋……

老赵深入到农村的男女老幼之中，和他们吃一锅饭，商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人们熟悉他，熟悉的不是作为文坛元老的老赵，而是老赵是咱社里的人。美国有位贝尔登先生，1947 年中国内战时期到解放区采访，会见了老赵，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个穿着粗布上衣，扎着头巾，似乎幽灵一样的男人，在解放区，

除了毛泽东和朱德，他是最有名望的人。过了10多年，赵树理的着装几乎没有改变。

在农村中生活，跟农民起居与进行创作的赵树理，被粗暴地批判为不写英雄人物，专写落后的、中间的人物。常常在半夜里被从被窝里拉出去批斗，最后关进了牛棚。对农村干部、对农村中的革命活动家的批判，赵树理直率地袒露自己的意见。就是在那种极不正常的待遇下，他也并没有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信心，要求对自己作品中的错误给予具体的批评，以便自己深刻检查。可是，这一要求，生前未能实现。就在这种苛刻的迫害之中，他也没有失去农民的乐天性，为了激励同受迫害的关在牛棚里的难友，他常常唱起一段上党梆子。

赵树理悲惨的死亡，是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且让我们看看悲惨死亡之前的赵树理，即那位被称作人民作家的赵树理是个什么模样。人民作家的崛起与悲惨的迫害致死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日本作家洲之内彻的小说《在枣树下》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这是专门搜集共产党情报的校官古贺大尉和在太行扫荡战中抓获的中共女党员大学生范桂娥在调查室里的一段对话。田坂以这样的问话开场：“中国文艺运动的新动向是指的什么呢？”

古贺认为田坂的提问不好回答，直视着范桂娥。

范却意外的爽利地回答了：“赵树理方向！”

“什么，赵树理方向？他一个人的什么方向？”

田坂从口袋里拿出来稿纸，紧接着追问下去。范桂娥叙述了太行区党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在那次座谈会上，讨论了文艺作品的大众化及提高文艺作品质量的问题，在热烈的争辩中，一个老百姓模样的人出现在讲台上，他说：我给大